

家乡的水土养人

□肖建国

我是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的，到1991年从湖南省作协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以后，由于工作忙、压力大，就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此前已经发表了300多万字作品，出版了近20本书。这里面有以县城生活为背景的，也有写农村的、写工厂生活的、写大学生活的、写城市生活的，但翻检旧作，仍觉得写县城生活的小说更踏实和舒服，有一种味道，更有分量。

县城当然不是我记忆中曾经生活过的县城了。但好多人家还在，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日子。我要探寻的就是他们这样过着日子的底细。我总是这样问自己，也问他们：日子是怎样过来的？而我笔下想要表现的也正是这些老百姓在变动时代里的日常生活状态。我在老街和陋巷中走，随时跟人聊上一阵，感觉身心特别放松。我在一篇随笔中写过，“我的小说背景大多是我的家乡，家乡中对我一人，尤其是写作者，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提神醒脑的作用……我在那些老街和陋巷上慢慢地走，以一趟一趟地走，努力找回那种基调、气息、氛围，还有家乡语言特有的韵味。我在那些已经踩路得光滑冷亮的石板街道上慢慢地走，找回了很多昔日的感觉，也捕捉到了一些小说创作的触发点。但更重要的是，舒缓了身心，让我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这次的定点深入生活，让我了解了湘南地区一些大村落几个家族的来源和流变，让我的生活库存中增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原型，让我增加了很多社会知识，让我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亲切的了解，让我更加确定了以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表现县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县城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结合部，是极具创作元素的地方。这里保留着一切传统的东西，却又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这里有国家该有的行政机构，也有外面都有的文化娱乐设施。这里还有一个个体户，有工人，有农民，有豪华酒店，有娱乐场所。这里的人在观念上也趋向时尚，但在感情上更接近乡下。这里同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跟乡村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尤其在这迅猛发展的时代转折期，县城的特点将会显得更加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吃透了县城也就吃透了中国。

在深入生活期间，我写了两个中篇和一个短篇，接下来打算再写几个中篇，同时也在酝酿长篇的写作。但我已经不满意过去的表现手法，更不愿意重复别人的老路子。我很希望在文本的探索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当然这会很难，相当难。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达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正是因为难，我觉得做起来才有点意思。

文学与生活

□罗伟章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既然跟古老沾上边，证明是根本性的话题。但每个人对这个话题的理解，包括同一个人不同阶段的理解，肯定不一样。就我本人而言，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我看见、我知道、我体验，是一种真诚写作，这种写作的好处是接地气，不足是视野局促。最近两三年，我经常反思自己以前写作遭遇的限制，可能是过分追求感同身受，过分追求大众体验，因而写作立场是一种集体立场，我眼里的现实生活，包括观察和判断，看上去带着“公共性”，实则给人突兀和孤立的印象，跟历史和未来割裂开来。这样的现实不是本质的现实，而是现实的假象。但我非常清楚，我心里有另外的东西，那是属于自己的熔岩。我出生在山里，那种熔岩曾经被山一样的严峻压制着，我的任务是解放它们，在观照我和你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的同时，也观照我和我的关系。

我经常回到故乡，这次定点深入生活也是回故乡。以前对故乡的观察是阳光和灯光照着的部分，现在着重观察和思考它的背面，也就是阴影的部分。我承认并理解了这样一句话：没有阴影的事物，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阴影更安静，因而也更真实，同时我还认为，阴影的模糊性恰恰体现了它的真实性，也为开放式想象提供了可能。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打通彼此之间的关联，让自己的写作获得与现实竞争的能力，获得纵深和宽广。这些其实都是常识，既是生活常识，也是文学常识，但对常识的认知和把握并不容易。常识在我这里依然是一个深渊，因此得小心翼翼。希望在自己以后的小说中，能部分地呈现这些常识。但我的精神倾向不会改变，比如同情、悲悯、关怀弱者的命运、探究人们恐惧和梦想的缘由，以及反对追风逐浪和鸡零狗碎的文学，坚信世界观和文学观的血肉联系，等等，都会保持它的一致性。我所要努力的方向，是怎样把这些东西表达得更好。作为一个写作者，随时提醒自己：必须既要知道自己身上缺少什么，更要知道自己应该坚持什么。

一个外地人的北京胡同

□荆永鸣

我对北京胡同并不陌生，作为进入北京的最初落脚点，自1998年开始，我曾在王府井地区的大甜水井胡同居住过5年时间，并且开了9年餐馆。

2011年，在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期间，我住在北京饭店。闲暇时到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转了半个下午，那条承载了我许多感慨与记忆的胡同已成为过去。如今，被拆改拓宽的街道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只是已找不到当年的半点影子。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以及像我等临时过客，也早已四散而去，茫茫人海，再无消息……也就是那一次，在一种感慨与“怀旧”情绪的促使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用外地人的视角写一写北京人。

我很快便写出了初稿，是个5万字的中篇。写作过程中，自己已经感觉到底气不足，写完之后没敢把它交给杂志社，而是怯怯地交给几个朋友看。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这篇小说找出了一大堆毛病。至此我才发现，自己对北京胡同里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熟悉。从小说中的人物把握还不够客观和准确，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戴着外来人的有色眼镜窥视这座大城市里的人。

对于这篇小说，我当时有两种考虑，一是彻底废掉，二是把它救活。而救活这篇小说的惟一办法，就是回到北京胡同补课，寻找过去生活里没有留意过、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王府井、和平门和前门地区的几十条新旧胡同中转来转去，通过和居民们的接触与聊天，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熟悉他们的语言，在庸常琐碎的生活中感受老北京胡同里的人文气息。

一个小说作者所要寻找的并不一定是生活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或者一个完整的事件。更多时候需要的或许只是一种“感觉”，以及这种感觉带来的思考。当时，我在胡同里的“感觉”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人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都会让我觉得“灵感一现”，让我突然感觉到：北京每一条胡同的产生、消失、兴旺和衰败，都在演绎着北京城的时代变迁。在这种变迁中，北京的文化越来越多元，而传统的老北京文化正在渐渐地淡出历史与本土的舞台。

于是，我把先前那个中篇推倒重来，重新结构，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两个中篇《北京房东》和《北京邻居》。作品很快在《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分别发表之后，被读者和评论家称为近年来少有的“京味”小说，并给予肯定与好评。其中《北

京房东》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分别以头条转载；《北京邻居》又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荣获《小说选刊》双年奖。在2012年的中篇小说年选中，共有5种选本收入了这两篇作品。

我对这次定点深入生活的总体感觉是，过去那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与带有“目的”的深入生活大不一样，前者是记忆的呈现，后者则可以使经验之外的问题迎刃而解。

生活，是作家永远的方向

□李春雷

生活就在窗外，就在身边，最主要的是要有一颗海绵一样的心，去扎扎实实地走进生活的水里，去虔诚地体验，去深情地寻觅，去静默地等待，才能感知到原始的脉动，才能遇到真朋友，才能获取最需要的东西。

去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重点作品《赶考》的创作任务。由于是过去了60多年的事，当事人大都去世，而我又年轻，根本没有战争的感觉。于是，我决定到西柏坡去感受战争，去感受那个时代。可是，由于时代变迁，特别是由于修建水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柏坡村就整体搬迁了，原村被沉于水底，现在的西柏坡其实是复制品。

但是，即使如此，走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走在那一片土地上，我也猛然找到了那种感觉，像触电一样。那种感觉通过我的脚掌，通过我的四肢，直抵我的心窝。那些睡眠在书页间和大地下的人们似乎又欢活了起来，他们排着队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我似乎影影绰绰地看到了一张张形形色色的面孔，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哭声、呼喊声、呻吟声。我在地上，他们在地下，我努力地用脚、用心、用手、用笔与他们相接、

2012：我的“定点”生活——2012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总结会作家发言摘录

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制度已实施3年，越来越多有创作实力的作家申报参加，一批深入生活之后的作品不断涌现，显示了其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生活是创作惟一源泉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初步实现了倡导作家进一步贴近现实的宗旨。这一切都在不断表明：深入现实生活是催生文学创作的有效途径。这里刊发的10位作家在2012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总结座谈会上的发言，由此给我们展现了他们在基层生活的感受和收获。



肖建国（左）在“引洮工程”工地采访



卜谷（左）在上杭采访96岁老红军蓝文才夫妇



肖建国（右）与嘉禾县城里的老人聊天



张艳茜（右二）与陕北长庆油田采油工人

相语。这时候，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感觉。

作家的创作虽是一个隐秘的手工作坊，但所有的原料都来自窗外的世界。只有采购到、搜集到足够货真价实的原料后，才可以端坐在书房里，沏上一杯茶，把繁乱的心绪放进茶杯里，浸泡、浸泡，直到静幽如禅。这时候，悄悄地拿起笔，开启电脑，肯定会有真境界、真收获。

雨果说过一句话：“富人凭借客厅里的寒暑表去判断冷热，穷人却只能靠皮肤去感受。”

作家是穷人，我们必须揣着一颗海绵般的虚心，去扎扎实实地走进生活，去体验，去感觉。体验到了美好，就诚诚实实地歌颂美好，感觉到了丑恶，就诚诚实实地揭露丑恶。

生活，是作家永远的方向。

定点深入与时代的关系

□弋 舟

此次定点深入生活，我申报的深入生活区域是甘肃省会宁县，采写以“引洮工程”会宁段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引洮”会宁供水工程是会宁县水利建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受益范围最广、关注程度最高的工程，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会宁县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洮入会”被当地群众誉为“救命水”、“幸福水”和“致富水”。这些生动的语言，集中体现了当地人民对于水的渴望，体现了国家实施重大水利项目的意义所在。

“引洮”工程重大，甘肃省专门成立了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我此次深入生活的选题既然选择了这项工程，那么，得到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的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申报定点深入生活之前，我已经与该局取得了联系，选题被中国作协批准后，该局给予我很大的采访便利，他们派熟悉会宁段工程情况的同志，多次陪同我一起深入会宁工程一线，介绍工程进度和遇到的困难，讲解相关的水利建设知识；走农户，反复沟通，讲政策、谈道理，争取最大程度得到被征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先后4次前往会宁，行程约2000公里，用时近一个月，收集到大量的生动素材，对于会宁县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引水工程的巨大意义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和认识。

在大量的采访记录中，我整理出数万字成型的文字，用作计划中的报告文学写作，同时也从中找到了新的写作源泉，拟以此为基础，创作出一个系列的中短篇小说。

通过定点深入生活，我感到此次的“定点”与“深入”为自

己带来了超出预计的收获，让我亲身感受到一项惠民泽世的大型工程产生出的巨大力量，感受到时代向前迈进的坚实步伐，感受到百姓的淳朴与坚毅，感受到建设者们的豪迈和奉献。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建设的贡献上，它更多地昭示出一种深刻的精神豪情。通过实践，我体会到定点深入生活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相信随着一批批作家在这一举措下走进基层，走进国家建设的第一线，必将会产生深刻反映时代图景的优秀作品。

在不久前一个文学沙龙里，大家谈到了“方向”，意在盘点我们这批“‘70后’年轻的老作家们”，写作多年后，彼此的方向是否已经清晰。令人欣慰，即便在众说纷纭之中，大家也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当我们最初本着天性提笔上路，顽强地解决着“怎么写”这个命题多年之后，“写什么”终于严厉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不是吗，当“奔跑”贯穿起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时间所赋予的严厉的内容，难道不足以收拢我们天性的目光，使其更为专注地投射到我们身边那些最具体而微的痛苦与欢乐之中？当我们以整全的视野来观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也许才能捕捉到最为本质的破绽，这将赋予我们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惟有此，才能解决我们多年的飘忽。

从青海尤甘宁草原到科尔沁沙地

□郭雪波

我自4年前完成70万字的长篇《青旗·嘎达梅林》之后，一直为下一部长篇小说做准备。这过程相当苦涩而艰难，光搜集和阅读的有关资料就有20余本、几百万字图书，然后就剩下我自己走出书斋，走进生活深层去更进一步感受、感悟和体验。

识到，我这次应该要为路遥去世20年之后，陕北人对路遥绵绵不尽的怀念做一些事。

在路遥去世之后的好多年间，我曾经零零散散地写了多篇纪念路遥的文章。我有幸与路遥同事7年，路遥的写作间就在我居住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一个四合院内。

这次定点深入生活是我再为路遥写出更多文字的很好契机。于是，我在路遥出生、成长、写作、体验生活的每一个县乡开始了认真的走访，收集到的素材足足两大箱。一路上当人们听说我是为路遥而来，纷纷给予我最大的便利。怀着对一个生命的无限追思，我开始为路遥起笔作传。在深入生活期间，22万字的书稿于2012年8月完成，我把这部传记取名为《路遥》。

回到草原

□千夫长

去年，我在呼伦贝尔草原行走了4个牧业旗：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从写作的角度看，幸亏回乡看了，曾经记忆里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已面目皆非了，我在小说里书写的童年记忆已荡然无存，恍惚中不知所措。生态令人堪忧，人心之变让人心生徬徨。原计划8月再回呼伦贝尔，顺着历史往回走，到蒙古人的发源地室韦住一阵子，从源头或许更能看清现在。可到了8月，我四弟他们开始在牧场打羊草，我喜欢打羊草，不过现在不用钐刀，都是机器。跟着他们打完羊草就是9月。看来去室韦得等下雪天了。

6月回去的那天，车在柏油马路上行驶，虽然很爽，这种感觉却让我习惯。以前草地上没有那么宽阔的柏油路，鸟儿也没见过这样的路。车没来的时候，鸟儿在路上自由自在好奇地玩儿，车一来就蒙了，傻子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飞，冲着车窗就飞来，“啪”的一下就撞死一只，我的泪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时候热烈地流了出来，我的心肠柔软了，为鸟的生命稍纵即逝而忧伤。

住在多年没住过的那个草地的晚上，我一个人在草地上闲逛。恍惚惚想起我的那些朋友来。从前，我们在草原喝酒，喜欢上一顿喝醉，下一顿喝醒。中午续接晚上，晚上喝到深夜，早晨还要空肚子喝牦牛酒，一直喝到中午再喝醉，回环往复，乐此不疲。

离开草地的兄弟们，过年回家第一天是不离开家门的，要和父亲喝一天酒。早晨开始，就从土坯房的窗户眼里往外扔空酒瓶，我们父子慢悠悠地喝着，喝空了就扔出去一个，一天喝下来要扔出去十几个空酒瓶。路过的人看到那堆闪闪发光的酒瓶，就知道我们回来了，就知道草地上那个赶了几十年马车的老头正在和儿子们喝酒呢。而且根据瓶子扔出的多少，来判断这一年回来了几个。

这次回来，父亲已经去世3年，我戒了酒。父亲不在，朋友们也散了。草原还有什么？只剩下了记忆。

向实践学习 拜生活为师

□余 艳

为创作《杨开慧》一书，我来到板仓。每来一次，都能从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嗅到烈士的柔美和坚强，想着烈士就在这里恋爱、生活和战斗，也从这里走向刑场……尤其在故居手稿发掘处，联想一个女人在那残酷杀戮下，带着三个孩子东躲西藏，思念着丈夫，被敌人追杀，她对爱情的无比坚贞、对革命的无比坚定，视死如归、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让我用从未有过的认真深入走访、潜心思考。将所有的走访都当作一次用心感悟的“现场体验”，一次难得的精神升华之旅。

我在湖南省作协工作15年，但出版的16部个人专著掏空了自己原本就不厚实的生活积淀。我深深知道，“缺生活”是我最严重的“缺血”。现在，我总算真正体会了“在基层、在路上、在现场”：在路上才会有鲜活，在基层才会有感动，在现场才会有真实。

为写好本书的难点——毛泽东和杨开慧、贺子珍的关系，杨开慧纪念馆的专家陪我去井冈山。就是这次走访，我们找到了有“井冈山”之称的刘晓农，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和民间故事、歌谣；也是这次走访，从民间访问探究到深入“两馆三地”参观学习，我们沿着毛泽东当年战斗的足迹，获取了大量史料、实料。同时，一次次被感动、被触动，让这次走访真正成为一次创新探索、精神洗礼、品质升华之旅。也正是被革命先烈的忘我牺牲精神感染，回来后努力思索、苦心琢磨、拼命积累，这才发现，感动其实已经化为创作的动力和作品的源泉……

怎样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流传久远的文学作品，成了我不敢轻易下笔、而是我深深沉入生活、多多积累、好好体验的动力。以往的文学作品，我都是写完了就出版，《杨开慧》这部书稿，改了三遍还不愿出手。就想写好、写得更好，才对得起烈士，无愧于读者。每一个疑点的破解、每一个更好的策划都在提醒我：作品会不会有人气，能不能接地气，有没有鼓士气。我深深体会到，深入生活就是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磨练的过程，只有这样，创作才有根基，作品才有价值，才可能在厚实的生活沉淀上谈自我突破，创作精品力作。

行走在生活的深处

□卜 谷

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一部书——《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子》。

闽赣交界的红林山区，有一片名字叫做泽覃的土地，村叫泽覃、乡也叫泽覃，它们的名字来自另一位叫泽覃的人。其中的渊源是，那位名叫毛泽覃的人，曾经战斗、牺牲在这片红林中；这村庄里有一个神奇的女人，她与毛泽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女人现年101岁，曾是红军战士，曾跟随毛泽覃、刘国兴打游击。毛泽覃遇难，她冒险前往认尸，枪口下她为毛泽覃擦洗尸身，居山守灵77年……

在定点深入生活中，我的采访得到突破性的进展。那些日子，我把采访的半径划得更大，深入到中央苏区范围的闽西长汀、上杭等县。我竟然找到并采访了当年曾随毛泽覃打游击的红军战士、96岁的老人蓝文才。蓝文才身材瘦削、精神矍铄、皮肤白皙，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从外表看颇有气质，像个文人，不像是一个长期经历苦难的人。至今，他的心仍然沉浸于那段苦难之中，他记忆力超群，尤其对那一段历史记忆深刻。

他告诉我，他要等待的人就是我，他已经等了77年。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件事，仿佛这些事就发生在昨天，他叫来儿子，郑重其事地用书面形式给我写了份委托书，要求并委托我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他是一把一颗心捧给了我。这是我采访、写作的价值，也是我理解的深入生活。生活的深处就是心灵的深处，是一般情况下人们不易触及的地方。生活的深处就是历史的深处，是历史背后的真实，是史书没有抵及或不易抵及的地方。

2012年的一天，我们安排了一次历史性对接，依然是那片红林山，96岁的蓝文才与101岁的张桂清走到了一起。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蓝文才一眼就认出了张桂清，并喊出了她70多年前的名字——张爱兰。一双青筋凸出的手，与另一双青筋凸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泪水在眼眶上流淌……

11月23日，蓝文才突然去世，他已经了却了一个夙愿。临终前，他交待儿子，我的书出来后，一定要给他的亲戚朋友们都看看。这话传递过来，我的肩膀就压了担子，心情异常沉重。